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

COLLECTED ESSAYS OF 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

中國典籍與文化

論叢



中華書局

9991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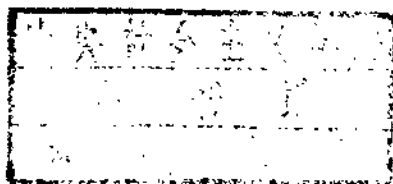
200310715

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

第 四 辑

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编



中 华 书 局

01000

执行编委：杨 忠

刘玉才

责任编辑：赵又新

2000/05

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

第 四 辑

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编

※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※

850×1166毫米 1/32×14印张·409千字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2000册 定价：29.00元

ISBN 7-101-01630-8/I·266

目 录

陶渊明年谱汇考	袁行霈(1)
寒山诗的宋代知音	
——兼论寒山诗在宋代的流布和影响	曹 汛(121)
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	郭英德(134)
兴化李氏与清初“昭阳诗群”	严迪昌(153)
关于《金楼子》研究的几个问题	跃 进(165)
八仙考补	周晓薇(185)
论《左传》为《春秋》之传	赵生群(198)
《左传》所见诸侯婚姻及政治关系考略	王连儒(227)
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	黄永年(253)
唐方镇僚佐职掌考释	戴伟华(269)
服虔《汉书音训》钩沉	陈建梁(283)
古籍整理工作中诗篇主名的困惑	陈 新(294)
论诗歌注解中的似是而非现象	王云路(299)
敦煌写本《秦妇吟》汇校	张涌泉(311)
明嘉靖本篆文《阳春白雪》考	葛渭君(342)
“儒宗诸书”与佛教史籍	
——兼论《四库全书》子部释家类的	
选录标准	曹 虹(352)

阮元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补正	王 辉(365)
明清《会典》性质论考	钱大群(408)
雅俗考	(日)村上哲见著 顾歆艺译(423)

陶渊明年谱汇考

袁行霈

叙曰：编纂陶渊明年谱，盖始于南宋，李焘有《陶潜新传》并《诗谱》各三卷，见《宋史》卷三百八十八《李焘传》，已佚。今存最早者为王质所编《栗里谱》，署“癸卯二月泰山王质谱”。癸卯为淳熙十年（1183）。此谱见其《云谿堂绍陶录》，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十六备载之，又见清陆心源《十万卷楼丛书》。王质，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五有传：“字景文，其先郢州人，后徙兴国。……著论五十篇，言历代君臣治乱，谓之《朴论》。”中绍兴三十年进士第，曾先后随汪澈、张浚抗金，入为太学正，被谗罢去。随虞允文宣抚川、陕，迁枢密院编修官。为中贵人所忌，奉祠山居，绝意禄仕。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卒。王质，节义之士，故特标举渊明。其《栗里谱》开首曰：“元亮高风，发于宋、晋去就之际。”知是谱有为而作也。

王质之后，编陶谱者尚有多人，余所见者：宋吴仁杰（字斗南）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，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杨时伟刊《陶靖节集》附；宋张缙（字季长）《吴谱辨证》，见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所引；清顾易（字中孚）《柳村陶谱》，清雍正七年顾易序刻本；清丁晏（字柘堂）《晋陶靖节年谱》，道光二十三年《颐志斋四谱》本；清陶澍（字

云汀)《靖节先生年谱考异》，见其《靖节先生集》附录；清杨希闵(字铁佣)《晋陶征士年谱》，光绪四年《豫章先贤九家年谱》本。民国梁启超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一书所附，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；古直《陶靖节年谱》，一九二六年中华书局《隅楼丛书》本，一九二七年订正再版；傅东华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诗》附录，一九二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；逯钦立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本，一九四八年出版。

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中国大陆发表之陶渊明年谱择其要者有：逯钦立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，见其校注《陶渊明集》附录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出版；吴云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论稿》附录，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；唐满先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集浅注》附录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；王孟白《陶渊明年谱简证》，见其《陶渊明诗文校笺》附录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；孙均锡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集校注》附录，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；李华《陶渊明年谱简编》，见其主编《陶渊明诗文赏析集》附录，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出版；邓安生《陶渊明年谱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；李华《陶渊明年谱辨证》，收入其《陶渊明新论》一书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；郭维森、包景诚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集全译》附录，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。另，王瑶所编《陶渊明集》系编年体，于渊明事迹作品有系年，其系年部分亦可视同年谱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。

台湾、香港、澳门有关陶渊明年谱及享年考证论文有：李辰冬《陶渊明作品系年》，见《大陆》杂志第二卷第三、四期，一九五一年出版；后李辰冬又有《陶渊明评论》一书，附《陶渊明系年补正》，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七五年出版；劳干《陶渊明行年杂考》，见《自由学

人》第二卷第三期，一九五六年出版；潘重规《陶渊明年岁析疑》，见《新亚生活双周刊》第五卷第十期，一九六二年出版；杨勇《陶渊明年岁应为六十三岁考》，见《新亚书院学术月刊》第五期，一九六三年出版；杨勇《陶渊明年谱汇订》，见其《陶渊明集校笺》附录，香港吴兴书局一九七一年出版；黄仲仑《陶渊明评传》附《年谱》，帕米尔书店一九六五年出版；方祖棖《新定陶潜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潜诗笺证校注论评》附录，台兰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，台湾书店一九八八年出版修订本；齐益寿《论古直陶渊明享年五十二岁说》，见《幼狮》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二期，一九七一年出版；吕兴昌《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旧说新证》，见《汉学研究》第五卷第二期；孙守侬《陶潜论》附《陶渊明作品系年各家对照表》，正中书局一九七八年出版；沈振奇《陶谢年表》，见其《陶谢诗之比较》，学生书局一九八六年出版；钱玉峰《陶诗系年》，台湾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；陈怡良《陶渊明年表》，见其《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》，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；刘本栋《陶靖节事迹及其作品系年》，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。

外国学者所编陶渊明年谱择其要者有：（日）村上嘉实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附录，富山房昭和十八年出版；（日）一海知义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（《中国诗人选集》四）附录，岩波书店昭和三十三年出版；（日）大矢根文次郎《陶渊明年表》，见其《陶渊明研究》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和四十一年出版；（日）都留春雄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（《中国诗文选》八）附录，筑摩书坊昭和四十九年出版；（日）冈村繁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：世俗和超俗》附录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昭和四十九年出版；（日）松枝茂夫、和田武司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（《中国之诗人》二）附录，集英社昭和五十八年出版；（日）南史一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见其《诗传：陶渊

明》附录，创元社昭和五十九年出版；都留春雄、釜谷武志《陶渊明关系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》（《中国古典鉴赏》十三），角川书店昭和六十三年出版；（日）长谷川滋成《陶渊明略年谱》，见其《陶渊明的精神生活》附录，汲古书院平成七年出版。

关于陶渊明年谱，有两篇带有总结性的论文：朱自清《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》，见《朱自清文集》第三册《文史论著》，开明书店一九五三年刊行；宋云彬《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》，见《新中华》复刊第六卷第三期。

许逸民辑校之《陶渊明年谱》共纂集年谱九种，传记五种，附录若干，颇便于实用，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出版。

编纂陶渊明年谱，而有冀于发现新资料几乎已不可能，倘能用更严谨之方法对已有之全部资料进行系统整理，或有希望得出较为公允切实之结论。本《汇考》遵循以下原则：

一、对已有之全部资料加以系统整理、通盘考察，不以枝节害全体。

二、对有关资料依据其可信程度加以分级，尽量使用第一级资料，以其他三级资料为佐证；不以次一级之资料轻易否定前一级资料。陶渊明之资料，依其可信度分为四级：第一级，陶渊明本人之作品，但大凡涉及其生平出处者，多有异文，相互抵牾，且由来已久，各宋本已然，何所依从，颇费斟酌。第二级，陶渊明友人所留文字资料，仅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一篇。第三级，后人所撰陶渊明之传记资料，梁沈约《宋书·陶潜传》、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、唐李延寿《南史·陶潜传》、唐房玄龄等《晋书·陶潜传》、佚名《莲社高贤传》等。第四级，后人评陶、咏陶而有助其生平考证之文字资料，如梁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、唐白居易《访陶公旧宅并序》等。

三、陶渊明作品应以各宋本为准，宋本互异者应考察其刊刻先

后择善而从。可以理校,但决不臆改。本《汇考》所据陶集各版本如下:汲古阁藏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^①,宋黄州刻本《东坡先生和陶诗》四卷^②,宋绍兴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,宋绍兴壬子刊曾集编《陶渊明文集》二卷,宋咸淳元年前后刊汤汉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^③,《四部丛刊》据以影印之宋本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十卷^④。

四、以准确理解陶渊明之作品为编纂其年谱之基础,以对其作品之胜解求其行迹之实际。

五、陶渊明之作品有标明甲子者,有虽未标明年代但有线索可寻以系年者,亦多有毫无线索可寻者。本《汇考》于第一类径直依其标示系年;于第二类详加考辨后系其确切年代或大致年代;于第三类则暂付阙如,不强作系年,以俟高明。

本《汇考》遵循上述原则,姑试为之。对前贤与时贤之论述,或有引用或有参考或有辨证,不吹毛求疵亦不盲目附和,不妄自标新立异,但求平正通达圆融。于现代学者中,梁启超、古直、王瑶、逯钦立、王叔岷诸家,参考尤多,所受启发亦多,均已随文标出,其余所引各家论述亦注明出处,不敢掠人之美。遇有未敢苟同者但申明己见而已,不敢有所讥诮。见仁见智,学术研究之常情,何况渊明之行迹因资料缺乏多有难以辨明者,未敢武断。其未能考明者则阙疑而已,不敢强作解事也。

本《汇考》所引渊明诗文,以汲古阁藏十卷本为底本,参校其他各善本。凡有重要异文均加以说明并作考辨。

陶渊明,字元亮;或云名潜;号五柳先生;谥曰靖节先生。

“渊明”于陶集中凡三见: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”(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);“渊明先亲,君之第四女也”(同上);“渊

明以少牢之奠，俯而酌之”（《祭程氏妹文》）。为外祖父写传，言及从父、母亲，断断不可自称字；祭妹之文亦不会自称字。此三处“渊明”皆自称其名无疑。字元亮，见沈约《陶潜传》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，向无异说。唯“潜”者聚讼纷纭，“潜字渊明”，始见于沈《传》“陶潜字渊明，或云渊明字元亮”，未知何据。但验之上引三处渊明自称其名之资料，字渊明之说实不可信。萧《传》曰：“陶渊明字元亮，或云潜字渊明。”颠倒沈《传》叙述之次序，有首取“陶渊明字元亮”之意，较沈《传》慎重。名“潜”之说或系由萧《传》所载渊明对檀道济曰“潜也何敢望贤”而来。但此处未必是自称其名，考晋宋间士人对话不乏自称字之例，如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载：褚裒乘估客船，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，亭吏趋之牛屋下，县令问是何人，“褚因举手答曰：‘河南褚季野。’”季野是褚裒之字。《晋书》卷九十四《隐逸·戴逵传》：“太宰、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，使人召之，逵对使者破琴曰：‘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！’”安道是戴逵之字。此两处皆名士对官宦之简傲口吻，与渊明对檀道济口吻类似，然则“潜”者或自称字也。但晋宋间双名而单字、一名而两字，不合习惯，未敢遽曰名“渊明”字“潜”。惟梁《谱》曰：“小名潜”，实不足信，渊明断无对檀道济自称小名之理。吴《谱》曰：“人宋更名潜”，此说或据萧《传》所谓“潜也何敢望贤”所作之推测，或系由刘程之以晋元兴中解柴桑令，隐居庐山，更名曰“遗民”（见唐释元康《肇论疏》）而产生之联想，或系由人宋所作诗不书宋年号之说而生之联想。入宋更名之大前提为渊明忠于晋室，此大前提原未必成立。即使忠于晋室，不书宋年号以示不承认宋朝犹可说也，更“渊明”为“潜”，有何说耶？若说潜而不仕，则早在晋朝已退隐不仕，人宋后未见其更逃入深山不知所终，则何必更名曰“潜”？更名曰“潜”，未能表示其忠于晋室如不书宋年号者，更名并无意义。且“渊明”二字中之“渊”字本与“潜”意相关，舍“渊明”而取

“潜”，亦属多事。梁《谱》引《礼记》“君子已孤不更名”（《曲礼下》），以为晚年更名，殆不合理。梁说有力，渊明固不必拘守古礼，然亦不必不守古礼而轻易更名也。

关于“渊明”、“元亮”、“潜”，三者意义之关联，古《谱》曰：“《易·乾·初九》：‘潜龙，勿用。’《九四》：‘或跃在渊。’四为初之应，四之渊即初所潜处。……《广雅》‘潜’训‘隐’，《说文》‘隐’训‘蔽’，隐、蔽皆有暗义。暗者，明之对也。亮，《说文》作‘惊’，云‘明也’。是亮与潜为对文，亮与明为同训。”

《五柳先生传》：“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”

《陶征士诔》：“故询诸友好，宜谥曰靖节征士。”

江州寻阳郡寻阳县（今江西九江市西）人。

渊明本人于其籍贯未尝明言，《五柳先生传》曰：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。”颜《诔》曰：“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，南岳（需案：指庐山）之幽居者也。……卒于寻阳县之某里。”前所言寻阳，其籍贯也；后所言寻阳县，其卒处亦即卒时之居处也。此为最可信之资料。

籍贯、出生地、居里、卒处、葬处，本系不同概念，后人种种异说，大抵是混淆其不同所致。籍贯是祖居之处，陶之曾祖为晋大司马陶侃，《晋书·陶侃传》：“陶侃字士行，本鄱阳人也。吴平，徙家庐江之寻阳。”又，陶侃《上表逊位》：“臣父母旧葬，今在寻阳。”寻阳即陶之籍贯无疑。陶之出生地，无考。后人所争论者实乃其居里，最为纷纭。兹先将其作品中言及居里者列举如下：

一、“庞为卫军参军，从江陵使上都，过寻阳见赠。”（《答庞参军序》）

二、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”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”（《归园田居》其一、三）

三、“与二三邻曲，同游斜川。”“彼南阜者，名实旧矣，不复乃为嗟叹。若夫曾城，傍无依接，独秀中皋，遥想灵山，有爱嘉名。”（《游斜川》）

四、“昔欲居南村，非为卜其宅。……怀此颇有年，今日从兹役。”（《移居》其一）

五、“良辰入奇怀，挈杖还西庐。”（《和刘柴桑》）

六、“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，因居寻阳。后作太尉参军，移家东下，作此以赠。”“去岁家南里，薄作少时邻。”（《与殷晋安别》）

七、“衔哀过旧宅，悲泪应心零。”（《悲从弟仲德》）

八、“行行循归路，计日望旧居。……谁言客舟远，近瞻百里余。延目识南岭，空叹将焉如。”（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其一）

九、“在昔闻南亩，当年竟未践。屡空既有人，春兴岂自免。”“日入相与归，壶浆劳近邻。长吟掩柴门，聊为垄亩民。”（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二首）

十、“畴昔家上京，六载去还归，今日始复来，侧怆多所悲。阡陌不移旧，邑屋或时非。”（《还旧居》）

十一、“草庐寄穷巷，甘以辞华轩。正夏长风急，林室顿烧燔。一宅无遗宇，舫舟荫门前。”（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）

十二、“山中饶霜露，风气亦先寒。……盥濯息檐下，斗酒散襟颜。”（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）

十三、“贫居依稼穡，勠力东林隈。”（《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》）

十四、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……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（《饮酒》其五）

十五、“居止次城邑，逍遥自闲止。”（《止酒》）

十六、“彭泽去家百里”，“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。”（《归去来兮辞》）

【考辨】

第一、六两条出现“寻阳”，可见寻阳乃其居处。第六条同时言及“南里”，则南里乃其寻阳诸居处之一无疑。第四条《移居》诗又有“南村”，当即第六条《与殷晋安别》之“南里”，亦在寻阳。唯以上十四条言及居处者均不见“柴桑”二字（诗题“刘柴桑”除外），然沈《传》明言“寻阳柴桑人也”，萧《传》从之，当如何解释？

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：扬州庐江郡下有寻阳县，而柴桑县另属荆州武昌郡。“惠帝元康元年（291），有司奏：荆、扬二州疆土广远，统理尤难。”于是割扬州之豫章等郡、荆州之武昌等郡合十郡，“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。”《宋书·州郡志二》曰：江州“初治豫章，成帝咸康六年（340）移治寻阳，庾翼又治豫章，寻还寻阳。”又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曰：“永兴元年（304），分庐江之寻阳、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，属江州。”“怀帝永嘉元年（307）又以豫章之彭泽县属寻阳郡。”元帝渡江，“寻阳郡又置九江、上甲二县，寻又省九江县入寻阳（县）。”“安帝义熙八年（412），省寻阳县入柴桑县，柴桑仍为郡，后又省上甲县入彭泽县。”然则，渊明出生之时，江州下有寻阳郡，寻阳郡下有寻阳县（除原辖区外，还包括一度所置之九江县），寻阳县是一大县，且为江州治所。据“柴桑仍为郡”一语可知，寻阳郡郡治在柴桑县。至义熙八年寻阳县才并入柴桑县。《陶侃传》既称其徙家庐江（郡）之寻阳（县），颜《诂》又称“寻阳陶渊明”，后又曰“卒于寻阳县之某里”，则可肯定渊明乃寻阳县（属寻阳郡）人。但渊明去世之际，寻阳县已划归柴桑县，仍在寻阳郡下，故沈《传》称陶“寻阳

柴桑人也”。颜《诔》曰“卒于寻阳县”乃仍旧日之区划。然《陶侃传》既明言徙家寻阳(县),渊明出生时寻阳县尚未划入柴桑县,柴桑又不为陶渊明本人及颜《诔》言及,则渊明之籍贯订为江州寻阳郡寻阳县为宜。

寻阳县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。柴桑县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。

至于其居处,则不止一处,其诗文中言及“南里”、“南村”、“西庐”、“上京”、“旧宅”、“园田居”、“古田舍”、“下谿田舍”、“城邑”;渊明另有田产称“南野”、“南亩”、“东林”、“西畴”、“西田”等。其居处与田产是否均在寻阳县,抑或有在柴桑县乃至更远者,均未详。然其大致方位犹有可考者,详见各诗文下。又,渊明诗文中所言“南山”、“南阜”、“南岭”,即庐山,必在其居处附近;“斜川”是其游邀之处,“中皋”、“曾城”是其在斜川所望见之山,究竟在何处,尚待考辨。又,白居易有《访陶公旧宅并序》,是宋以前唯一关于渊明旧宅之实地考察资料,其中提到庐山、柴桑、栗里。其序曰:“予夙慕陶渊明为入,往岁渭川闲居,尝有《效陶体诗》十六首。今游庐山,经柴桑,过栗里,思其人,访其宅,不能默默,又题此诗云。”诗中有曰:“柴桑古村落,栗里旧山川,不见篱下菊,但余墟中烟。”然居处、田产所在、游邀之处,仅可作为考证其籍贯之参考,而不能直接视为其籍贯之所在耳。

又有陶渊明始家宜丰之说,不可不辨。此说之最早根据为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,其于渊明故里下曰:“《图经》云:‘渊明始家宜丰,后柴桑。’宜丰,今新昌也。”《图经》系流传于宜丰当地之地方史乘,今已不存。明王道《重修新昌县志序》曰:“盖自县宜丰时,即有《图经》之传。”宜丰立县在三国吴时。然乐史所见显然是南朝宋代以后续修者,故有渊明故居之记载,唯其修纂年代已不可考。自乐史后,

渊明始家宜丰之说为后代所修当地方志所采，又为当地所修靖节祠堂之题记所袭，兹不备引。仅录清康熙癸亥（1683）所修《新昌县志》卷四《人物志·名贤》所载《陶渊明传》如下：

晋陶渊明，字元亮。初家宜丰。父回为姿城守，以平苏峻功封康乐伯，食邑在今义钩乡。隆和元年大旱，回免其采地租入，人怀之。号其里为太平、怀德，即今太平乡怀德市。太元十八年，先生起为江州祭酒，寻居柴桑，游南康。刘敬（宣）为江州刺史，镇浔阳，辟先生参谋。义熙元年，令彭泽，八十余日解绶。十二年冬，挟少子佟还宜丰，父老喜其归故里，因以名乡。后数年，往视其子俨于柴桑里，遂逝焉。归葬宜丰。子五人：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。今宜丰十五都故里团，渣溪陶姓，公五子之后也。有先生读书堂、洗墨池、靖节桥，遗迹在焉。

后有胡思敬者^⑤，纂《盐乘》一书（宜丰县城西南郊有五盐陵，五代南唐曾以宜丰旧地为盐步镇，盐为宜丰之代称），刊于1917年。于《人物志》内列《陶潜列传》，复广征佐证十则大倡始家宜丰之说。今宜丰当地研究地方史志者仍坚持此说。刘师舜《陶渊明的故乡——最初是江西宜丰不是寻阳柴桑》^⑥亦主渊明故里为宜丰。陈怡良《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》广泛征引资料，曰：“综合以上所引，可知陶公故里，初为宜丰义钩乡，而后始迁寻阳柴桑，当为可能之事。”

此中须辨明者有三：始家宜丰之说最早见于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引《图经》，其他佐证均由此引出，更晚于乐史。《图经》今不存，其年代既不可确考，其真实性亦无以判断，故此说颇可怀疑。尤为要者，此说于陶诗文中无一内证，亦不见于颜《谏》、沈《传》、萧《传》，显系当地之传说。故其价值亦只能停留于地方传说之层次，

而不足取信于严谨之学术考证。此其一。清修《新昌县志》、胡思敬《盐乘》所言陶之生平行踪，显系由始家宜丰之说敷衍而成，颇多疏漏之处，如渊明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前一直家于宜丰，何以只字不见于其诗文？自州祭酒罢归何以不回宜丰家中，而久居柴桑，直至晚年方回宜丰，寻复回柴桑而卒？如不能对此类问题给予合理解释则终难服人也。此其二。“始家”二字涵义较模糊，此所谓“家”者，其本人之家欤，其父之家欤？始家宜丰是否即生于宜丰？或仅居家于宜丰？此“始”又始于何时？均不得而知。可以肯定者，始家宜丰决不等于籍贯宜丰，因而亦不可径称渊明为宜丰人氏。然而始家宜丰说仍不失其参考价值，渊明早年或曾在宜丰居住，晚岁复一度携少子佟回宜丰，今渣溪陶氏或即佟之后。此说出自当地陶氏族谱，沿袭已久，或非附会，亦未可知。诚所谓察无实据事出有因也。

曾祖陶侃，晋大司马，封长沙郡公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（需案：当作“孙”）序》：“余于长沙公为族祖，同出大司马。”《命子》：“在我中晋，业融长沙。桓桓长沙，伊勋伊德。天子畴我，专征南国。”颜《诔》曰：“韬此洪祖，蔑彼名级。”沈《传》曰：“曾族侃，晋大司马。”萧《传》同。陶姓封长沙公，而又任大司马者，在东晋仅陶侃一人，陶诗中内证确凿，且魏、晋、南朝重谱谍，以陶侃之显赫，沈约修《宋书》必能见之。故曾祖陶侃本无可疑。

然李公焕注《赠长沙公族祖序》，断句为“长沙公于余为族，祖同出大司马。”注曰：“汉高帝时陶舍。”李公焕虽以序中所云大司马为陶舍，但并不否认陶侃为渊明曾祖，见《命子》诗注。至清阎咏则据李注大司马为陶舍，证明渊明不出于侃，说见《左汾类稿》，谓《赠长沙公》之“大司马”当作“右司马”，指汉高祖功臣舍，“念兹厥初”之“初”指汉初，否则不得曰“昭穆既远”；又谓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